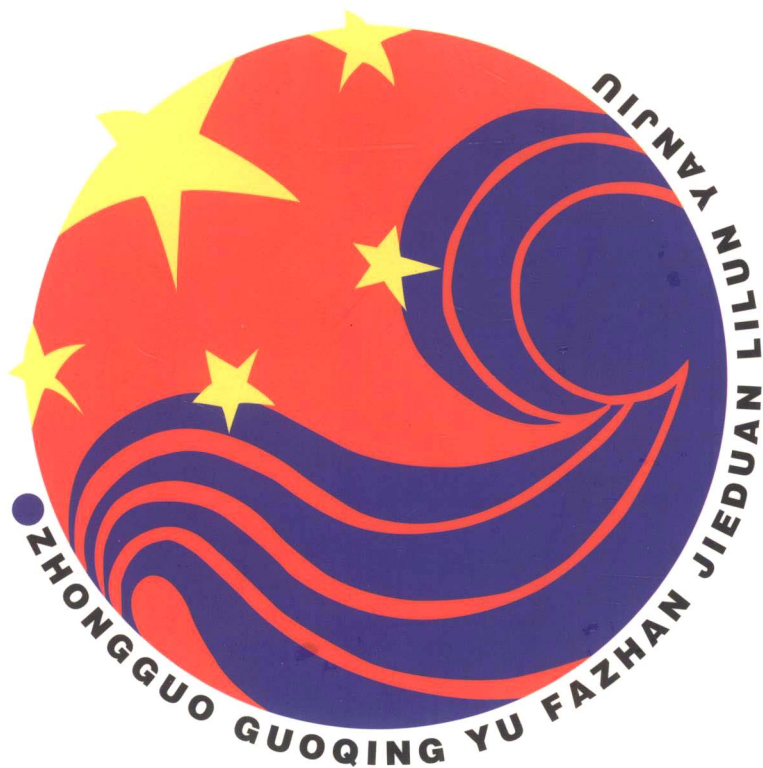


●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系列研究

● 王毅武 主编



● 李俊 著

中国 国情与发展阶段理论 研究

南方出版社

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理论研究

● 李俊 著

HONG GUO GUO QING YU FA ZHAN JIE DUAN LI LUN YAN JIU

南方出版社
2001.12

责任编辑:刘 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理论研究/李俊著. - 海口:南方出版社,
2001.12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系列丛书)

ISBN 7 - 80660 - 465 - 0

I . 中… II . 李… III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经济理论 - 研究
- 中国 IV . F1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398 号

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理论研究

李 俊 著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

电话:(0898)65371546 邮编:570203

海南大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35 千字 印张:14.75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200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ISBN7 - 80660 - 465 - 0/F·10

定价(全套六册):180 元

总 序

——注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理所当然包含着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丰富与创新的理论轨道与历史过程研究，亦即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研究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尤其不能忽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的条件、环境及其自身的特点、功能与趋势。

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的重要学术领域。

如果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面传入中国起，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至今已经 80 多年；从新中国成立起，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实践的基础上得以丰富和发展已经半个世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并日趋具有中国特色也已经 20 多年。这当中，有一系列的经验、教训及理论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虽然是以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经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就必然产生丰富的内容与具体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与中国特点，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思想财富，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与概括。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由于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

主要领导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他们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认真总结其中的贡献与不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几代执着追求、坚持真理的经济学家、经济理论工作者们的理论贡献,甚至以生命或自由为代价的对于真理的捍卫和从实际出发的无畏探索,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令人深思。

科学地总结、归纳、概括和宣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如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结论已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又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与创新提供了好环境,因而认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发展与丰富、创新的历史条件与具体内容,深刻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及系统总结几十年的奋斗历程,就成为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及研究方法也就确定了。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不同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思想史,也不同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但它是中国古代与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必然接续与延伸,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是研究并阐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发展与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它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与内容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概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及创造

性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形成与发展、丰富的历史轨迹，科学地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断丰富、发展与创新的过程，同时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的理论反映。它还将证实，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与认识的理论浓缩，而且是中国人民奋力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经验总结，同时还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思想。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基本任务，在于运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揭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具体地阐明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及相应发展阶段的条件、状况、特点及其规律性；正确地评论各种经济观点、思想、学说及理论体系并预测它们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趋向与历史作用。这三个方面或层次是互相关联的整体，特别是第三个方面或层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基本任务又可以概括为互相联系的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如何“在中国具体化”的？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是怎样“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的？正是这样两个“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任务。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中文本”，并没有什么自己的独创或“新鲜货”，因而不值得建立一个什么“新学科”去研究它。

无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的产物，但是，必须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包括一些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吸收、消化并使之中国化的过程。应当承认,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两种表述有重要区别)的国家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接受并再创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根基与需要,以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为代表的中国独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明证!另一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抽象并锤炼出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着极大的理论活力和中国特色!显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但是,如果无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结合的结果,无视中国的这块土地具备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落地生根、发芽结果的客观条件,无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丰富内容与中国特色,那么,就只能站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有色玻璃”之后,大呼小叫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过是“舶来品”,把自己摆到了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位置上,既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所书写的独特一页,也理解不了中国人民在一个占世界人口 1/4 的条件极为艰困复杂的国家里所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奇迹。事实上,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理论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毫无疑问地填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空白,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何为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著述中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现成理论;同样,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同中国这样复杂、生动、艰巨、广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去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因而赋予了其理论形式如此丰富的内容与独特的色彩。从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到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之路;从消灭私有制

到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从“三个为主、三个补充”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等等,难道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难道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中文本”?难道不值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崭新学科去研究这些如此丰富与新鲜的理论内容?

还有一种认识,即现在系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时尚早,局限性太大。

不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如果从 1917 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算起,至今也才 80 多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果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算起,不过 50 年。无论 80 多年还是 50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仅仅是一瞬间,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来说,却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首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件,需要我们去认真地、科学地、客观地加以研究和总结;其次,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及其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大功劳,值得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史上大书特书;再次,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得以继续完善和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其新鲜活泼、求实进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自立于各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亟待我们去系统地归纳与总结。这些艰巨而又庞杂的研究任务,现在不是“为时尚早”,而是为时未晚。说及“局限性”,不能因为可能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问题的研究中出现局限性就放弃研究,而是应当在研究中注重科学性,防止和避免可能出现的局限性。况且,局限性是永远存在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切实遵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只搞歌功颂德式的研

讨,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即是,非即非,正确则褒扬,谬误便引出教训。实际上,任何伟人与学者,都摆脱不了特定的历史环境,都不可能不受历史的和时代的局限,这反而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指出这种局限性。换言之,评论特定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或经济理论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局限性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既然“现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时尚早,局限性太大”,那么,何时开始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没有局限性了呢?当代人研究当代史害怕有局限性,后代人研究前代史难道局限性就可以消失么?平心而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留给后人去总结和概括,局限性恐怕也还是存在的,就如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研究素材的获取和历史环境的把握。

当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实事求是地指出某些伟人或学者的经济观点、思想、学说的缺陷、矛盾甚至谬误,比起肯定与褒扬他们的经济观点、思想、学说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在经济理论评论不怎么兴盛的情况下就更有难处了。这恐怕是前面所谓“局限性”的依据之一。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和马寅初分别从两个方面为我们树了一代新风。孙冶方一生为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而百折不挠,他的经济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理论的一贯性,既不“随风”,也不“趋势”,身陷囹圄也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思考,他还坦诚地要求学术界同仁依据实践检验与评判他自己经济理论的利弊得失,欢迎对他的经济观点、思想指名道姓地进行评论;马寅初则更以“敢怒敢言见精神”而著称于世,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学习。如同文艺批评一样,经济理论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应该有批评,如果没有批评,其生命与活力则是很有限的。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国别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又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主干部分)。就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关系而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 1911 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与学说的总和。从经济理论的性质、目的与基本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干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理论,是中国人民奋力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实践总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科学地说,其发端应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经济理论;其二是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的经济思想及其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理论,这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是辛亥革命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既非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体系,也非中国国民党经济思想体系的经济思想,诸如“实业救国论”、“中国工业化论”等等,亦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尚属新开拓的学术领域,对这一学术领域一系列课题的研究刚刚起步,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亟待加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扩展以及如何把中国古代、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向现代延伸与持续,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进行。

从海峡两岸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现状看,亦不尽人意。

一是双方各自对这方面的研究都很薄弱,不仅对海峡彼岸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的研究是薄弱的,甚至对自己经济思想与理论的系统总结也是薄弱的;二是双方几乎没有交流,渗透与互补就更无从谈起;三是双方都没有把海峡彼岸的现代经济思想与理论视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必要与必然的组成部分,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不完整性或片面性。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与创新的最新成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当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适应经济发展的认识深化过程。有人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也有人认为,在邓小平 1992 年视察南方讲话之前,中国谈不上什么市场经济理论。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回答是否定的。理论的产生、发展与完善无疑也是一个过程。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当时党的领导者对于商品经济与市场问题就已经有了若干可贵的认识。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将通过“中心市场”分配生产品,国家应该保持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相应”关系;瞿秋白通过对苏俄的实地考察,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市场”;李达从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强调社会主义“不可不行使货币经济”;陈独秀在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时,也曾提出商品经济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时“不可避免”;王学文 40 年代在延安时就从“劳动部分个人所有制”说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①;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

^① 参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王毅武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①”也并不否定商品经济及其市场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他对于价值规律及市场问题给予了极大重视,直到他的晚年对于商品、货币关系也还有不少深刻而又中肯的论述;刘少奇认为,新中国应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要有多样性,要适当发挥市场的作用;陈云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提出了“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离不开市场^②。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各自的理论研究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涉及市场问题,在我国各高等院校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没有一本不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一生最有开拓性的贡献,就在于创造性地论证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必然性(1956年),果断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经济学家卓炯则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早期形态)的开拓者之一(1961年),关于商品经济的阐释与论证,贯穿于他的全部理论著述之中^③。即便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了等号的情况下,商品经济与市场问题在实际上仍然无法回避,市场经济理论至少是在被“批判”的形式下顽强地表现着自己。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不仅在于他长期以来多次反复强调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与必然性,而且在于他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一锤定音,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以合法的、正统的理论登上了学术研究与经济理论的前台。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所要研究的基本内容,当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重要任务。

总之,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还是一个崭新的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9页。

② ③参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王毅武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领域,需要有志于此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奋力开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人们将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迫切需要进行全面的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亟须加以系统的介绍。通过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与基本内容的全面总结和系统介绍,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有助于全面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有助于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有助于切实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有助于从理论上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化;有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中国化。一部生动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论断的形成史,是一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重要结论的理论史,同时更是一部“中国形式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

开展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决非易事,确实是困难重重。首先是资料方面的困难,特别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早期方面;其次是研究方面的困难,因为人们普遍遵循“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原则,加之在某些方面的研究确有若干难处;再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五四运动发端以来,从史的角度来说,为时尚短,难于概括。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热诚希望学术界的同仁们共同努力,奋勇拼搏,加强并深入探讨,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来浇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含苞欲放之花。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

王毅武

海南大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所所长

(原载《海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导 论

一个国家的国情，内容相当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科技、社会、历史、自然等各个领域，并且上述各方面的内容又处于相互联系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国情是一个综合范畴和动态概念，对国情的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力是国情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表现。要正确认识国情，就必须正确把握国力。所谓国力，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所具有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及国际影响力，简言之，综合国力。综合国力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科技、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主要方面的实际力量。其中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和民族的综合素质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综合国力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部分。正确认识国情，是冷静、客观的考察并驾驭国力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制定发展战略、经济方针与政策的客观与理论依据。无论是对国情的科学认识还是对国力的客观把握都离不开对二者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和定位。对国情、国力的正确判断当然有助于对社会经济运行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和定位，反之，正确的历史定位即对社会经济运行发展阶段的认识和判断又会影响对国情、国力的认识及正确性。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关互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复杂过程。

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关注，其历史线索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

前的遥远年代，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关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和见解散见在他们浩繁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和文化的著述中。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使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被迫中断，中国社会在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下，加之清朝腐朽的统治，一步一步地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先进的中国人，自龚自珍以来，历经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洪仁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到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发展阶段的判断便深深地赋有了近代历史的内容。这个认识过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中的国情论和发展阶段论便渐趋系统化、理论化，进而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五·四”爱国运动，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进的中国人和新时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着中国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和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在启蒙和救亡的竞相挑战和双重变奏中，勇敢地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论战入手，开辟了主要从政治形态、经济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认识和研究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新时代。这场理论论战和思想交锋，实际上是既往对中国国情论、发展阶段论和中国社会性质认识在新条件下的延续、拓展和深化。就较成熟的学术理论形态而言，其典型代表有陈独秀的“封建主义论”（二次革命论）、王明的“资本主义论”（一次革命论）、毛泽东的“双半论”（两步走论）。另外，以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为代表的新思潮派和以严灵峰、任曙为代表的动力派의思想和见解以及相互之间的思想交锋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等等。而现代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用不争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国情论和发展阶段论——半封建半殖民地论和新民主主义论，是对当时

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科学、深刻、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对国情论和发展阶段论的认识开始了逐渐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情论和发展阶段论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国情论和国力论的转变，同时对中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也提到了相应的高度。国情论主要侧重于社会性质方面的认识和研究中国国情的基本状况与特点，突出国情中量的规定性，是对中国社会的客观描述和认识；国力论则主要侧重于生产力方面的认识和研究中国的基本实力，突出国情中质的规定性，阐明社会及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发展阶段论，实质是历史定位论，强调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水平和历史方位，阐明该社会经济形态处于人类历史发展“坐标”或“曲线”的基本位置。“国情论”到“国力论”，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国情论”合乎逻辑的丰富和升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把“国情论”和“国力论”统一起来，使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情论”上升到战略理论的高度，它们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上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的全面生动的轨迹和图象。从“一化三改”路线结束的1956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二十多年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并结合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十分可贵的思想，将建国以后的国情思想推向一个高峰。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尤其是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估计，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和规模上，违反国情，超越国力，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犯了小生产式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有关国情论和发展阶段论的思想和见解，便开始由高峰往下滑，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悲剧。前进与曲折，光荣与梦想，探索与失败，正

确与谬误，几度大悲大喜，多少是非曲折，构成了一曲扼腕叹息和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痛定思痛，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思想为代表的“左”倾和极“左”倾的错误理论和错误路线，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解决了从1956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在总结过去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中国国情、国力、发展阶段和对外关系等重大问题重新认识和思考，提出并逐渐丰富了关于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政策，在此指导下，开始进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大转变，市场总环境和对外开放的总格局都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历史性巨变。在总结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的基础上，终于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从国情论、国力论和发展阶段论统一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样一个全新水平上。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对外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等内容在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一个不断发展和逐渐完善的理论体系、时代课题和极富特色的社会形态。在新的探索 and 实践中，通过理论创新，中共十四大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共十五大面向新世纪的改革开放论均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成果。中共十五大十三个方面的理论创新均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理论基础和逻辑出发点，最突出的创新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系统完整的基本纲领，从而使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